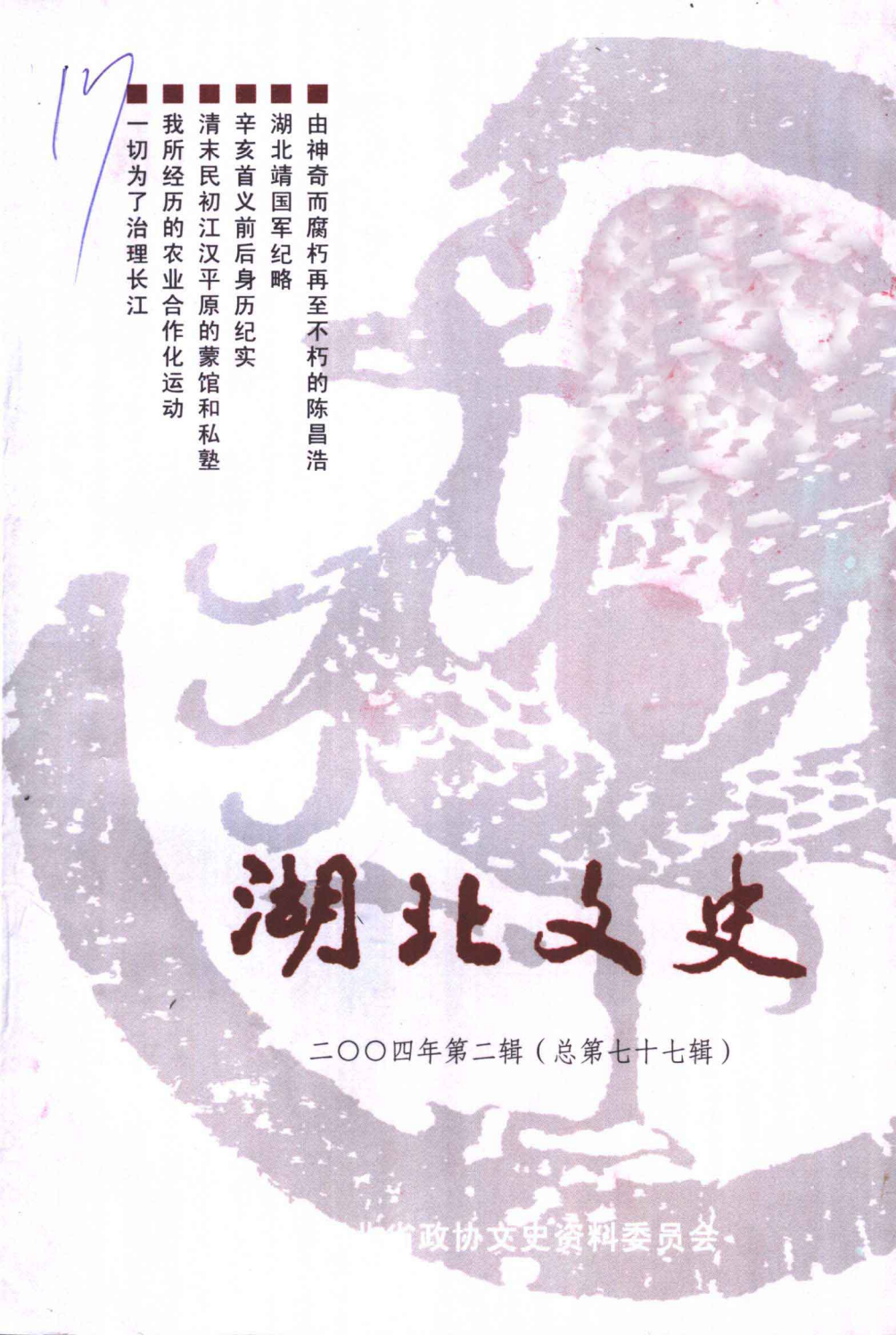


- 
- 12
- 由神奇而腐朽再至不朽的陈昌浩
 - 湖北靖国军纪略
 - 辛亥首义前后身历纪实
 - 清末民初江汉平原的蒙馆和私塾
 - 我所经历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 一切为了治理长江

湖北文史

二〇〇四年第二辑（总第七十七辑）

湖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湖 北 文 史

二〇〇四年第二辑

(总第七十七辑)

湖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湖 北 文 史 (半年刊)

2004 年第 2 辑 (总第 77 辑)

主办: 湖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出版: 《湖北文史》编辑部

印刷: 湖北省政协印制室

出版日期: 2004 年 12 月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7

字数: 175 千字

(2004) 湖北省内部资料准印证第 2092/SG 号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 2002年5月4日，李鹏委员长
视察楚天激光集团



▶ 王光英副委员长
和春天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进交谈

▼ 2001年4月13日省长张国光视察
九坤集团承建的学生公寓超市



领导视察

▶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八日副省长王少阶、副市长涂勇、区委书记李富生、区长黄克强等领导出席洪发集团承建的狮城教师公寓开工典礼



▶ 市领导罗清泉、李宪生、刘善璧、涂勇等视察顺达公司承建的三环线南环段工程



▶ 市委书记罗清泉莅临蓝星电脑集团参观指导



▶ 市委书记罗清泉、区委书记李富生等领导视察天服饰公司



目 录

时 代 追 踪

- 由神奇而腐朽再至不朽的陈昌浩 夏明星 吴宏伦(1)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机构的演变 薛 毅(18)
湖北靖国军纪略 曾榆村(28)
追寻沙洋“五七”干校旧事 陈国强(44)

沧 桑 看 云

- 辛亥首义前后身历纪实 陈绍武(52)
回忆解放战争中的宜都战役经过 徐光宇(76)

江 汉 寻 梦

- 清末民初江汉平原的蒙馆和私塾 朱国南(86)
我所知道的武汉大学“六一”惨案 刘庄如(99)
我所经历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柯安亭(107)
回忆我的父亲胡拓先生 胡井远(126)

闻 人 聚 焦

- 一切为了治理长江 陈志宏 刘崇熙(144)
老汉口城市建设的奠基人 杨志超(166)

从满清臬台到民国省长	张燃明(177)
抗日战争时期的程汝怀	周瑞清(186)
清节自励的王芳荃教授	陈礼荣(199)
近代荆州五位藏书家	刘作忠(208)

夏明星 吴宏伦

由神奇而腐朽 再至不朽的陈昌浩

在大型史诗性巨片《长征》中，有毛泽东为粉碎张国焘分裂阴谋而斥退陈昌浩所派追兵的一场戏。看到这里，有心的观众或许会问：“陈昌浩是谁？”

陈昌浩是谁？此人来头甚大，他曾领导过我党、我军一大批叱咤风云的人物，如徐向前、李先念、徐海东、许世友、陈锡联、洪学智、秦基伟、张震、刘华清等。昔日，他们中有的人仅仅是陈昌浩麾下的连长、排长而已。终其一生，诚如一位研究者所言，陈昌浩是“由神奇而腐朽、白腐朽而不朽。”

善战的骁将与极“左”的“肃反”

陈昌浩，曾用名苍木，1906年8月出生于湖北省汉阳县（今武汉市蔡甸区）永安堡戴家庄（今武汉市蔡甸区），早年入武昌大学学习，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5月任共青团湖北省委宣传部干事。

大革命失败后，陈昌浩在武汉地区坚持过一段时间的地下斗争。1927年9月，经党组织选派，他离别已怀胎数月的妻子刘秀贞和长子陈柏生（陈祖泽）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动身前，陈昌浩为妻子腹中的孩子取名“洋生”（陈祖涛），意为“父亲留洋

之际出生”。到苏联后不久，陈昌浩便成为中共预备党员，与张闻天、秦邦宪等人同为中共在苏联的“二十八宿”之一。1930年10月，陈昌浩回到上海，12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曾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常委、团中央委员等职。

1931年4月，受中共中央派遣，由周恩来亲自委托顾顺章安排，陈昌浩跟随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化装成商人，从上海杨树浦码头乘船前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共青团鄂豫皖中央分局（少共特委）书记。6月下旬，在河南新集召开的鄂豫皖苏区党员代表大会上，陈昌浩当选为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9月中旬，陈昌浩又被任命为红四军政委。

同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成立，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在“党指挥枪”的原则下，陈昌浩成为这支劲旅的直接指挥者，时年仅25岁。

虽然贵为一军统帅，陈昌浩常常亲历战阵，在黄安（今红安）之战中更是勇冠全军。12月22日上午，陈昌浩乘坐着我军第一架飞机“列宁号”（1930年2月，四川军阀刘湘的座机因燃料耗尽迫降在鄂豫皖苏区宣化店境内，为我所获，苏区军民命名为“列宁号”，是为我军第一架飞机）向黄安城内敌师部投下捆绑的迫击炮弹和大量宣传品，炸得敌人魂飞魄散，从心理上摧垮了敌人的防线，使红军很快就攻占了黄安城。之后，他又参与指挥了商潢、苏家埠、潢光等著名战役。

1932年10月，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被迫率红四方面军进军秦岭、大巴山区。在连克川东北数座重镇后，他们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从此时起至1935年3月，陈昌浩直接指挥的红四方面军稳步地把川陕革命根据地创建成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苏区。

1933年6月，在成功地粉碎了四川军阀田颂尧部的“三路围

攻”后,红四方面军在旺苍木门召开军事会议,将原有的4个师扩编为4个军,确定最高军事领导机关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任主席,陈昌浩、徐向前任副主席,红四方面军名将曾中生任参谋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方面军总指挥部、总政委、总政治部,徐向前为总指挥,王树声为副总指挥,陈昌浩任总政委兼总政治部主任。此时,陈昌浩麾下的红四方面军已有5万之众。之后,他又参与指挥了反四川军阀刘湘部“六路围攻”作战及嘉陵江战役等重大战事。

但是,在陈昌浩的革命人生日益辉煌的同时,他的负面历史也已经开始,据徐向前元帅回忆:“在陈昌浩接任红四军政委后,即开始在部队中‘肃反’……陈昌浩抓起来的那些红军干部,都是跟我们一起打游击走过来的,作战勇敢,平时没有什么异常表现,一夜之间就成了‘改组派’、‘AB团’,使人不可理解。”在屡立战功的同时,他亲自批准捕杀了红四方面军名将许继慎、周维炯等人。1933年9月,他又批准逮捕了红四方面军名将曾中生。曾后被杀害。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陈昌浩被增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同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瞎指挥,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要是红一方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长征。1935年5月,由于敌情所迫,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也被迫率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进行长征。

长征路上的功过是非

在长征中,陈昌浩的功过是非一言难尽。

1935年6月16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要求其“北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战略方针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次日,张

复电中央：应集中兵力西进，占领青海、新疆，如有困难就暂时“南下”。这样，中央和张国焘在“北上”还是“南下”、“适当时期”“西进”还是“应集中兵力西进”问题上产生分歧。

6月下旬，红一、四方面军在夹金山北麓的达维桥胜利会师。不久，为解决统一指挥问题，中央军委增选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为军委委员。可是，7月18日，在张国焘授意下，陈昌浩却致电中央，建议让张国焘担任军委主席，朱德改任前敌总指挥，大有“逼宫”之势。为维护两军团结，稳住张国焘，中央军委任命张为红军总政委。同时，军委决定成立前敌总指挥部，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并为陈、徐二人颁发了金质红星奖章。

8月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沙窝会议，增选陈昌浩、徐向前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命陈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会后，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组编为左、右路军：左路军由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率领；右路军由陈昌浩、徐向前率领，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等随右路军行动。8月20日，在左路军开拔后，中共中央在右路军驻地毛儿盖召开了会议，史称“毛儿盖会议”。据徐向前回忆，陈昌浩在会上表现是积极的：

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会议首先由毛泽东发言。……陈昌浩的态度很坚决，主张快速北进，集结最大兵力，向东突击，以实现中央既定方针。毛泽东很高兴，还特地表扬了陈昌浩的发言。会议最后决定，以毛泽东的发言为基本内容，形成《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

8月底，右路军顺利通过草地，并以陈昌浩节制的红四方面军为主胜利地进行了包座战役，为左路军北上奠定了基础。

但是，张国焘却无意北上，多方找借口要求右路军南下川藏边。据记载：1935年9月9日，张国焘密电陈昌浩，指示其劝毛泽东等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

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由于叶剑英知道后及时密告中央，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得以脱身，这就是党史上著名的“密电事件”。

50多年后——1986年9月，徐向前在《红四方面军的英勇长征》一文中还对“密电事件”及其前后情况记忆犹新：

张国焘顽固坚持南下方针，拒不执行党中央的北进指示，九月八日电令我和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我们夹在中间，十分为难。陈昌浩和我商量，决定由他带上电报，如实向党中央汇报。当晚，中央领导同志召集我们在周恩来住地开会，针对张国焘的南下电令，以（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七人的名义，电告张国焘，陈说南下之弊与北进之利，着其执行北进方针。张国焘九日复电，仍坚持南下。陈昌浩这时改变了态度，同意执行张国焘的南下命令，我不愿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也同意南下。

十日凌晨，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前面有的干部不明真象，打电话来问：中央红军单独走了，还设警戒哨，我们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过后，我们根据张国焘的命令，率四军、三十军及红军大学部分人员再次越草地，开始了南下的进军。

根据徐向前回忆来看，陈昌浩在“南下”、“北进”问题上本来是服从中央的，后来虽然“改变了态度”，但也没有根据张的命令武力阻截毛泽东等人，因而不能随意地给他加上“张国焘之流”的帽子。在徐帅回忆中，他使用了“张国焘九日复电”而不是“张国焘九日密电”的表述，似乎他认为不存在所谓“密电”。

9月15日，张国焘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率左路军再次过草地南下。10月5日，张公开在四川卓木碉另立“中央”，妄贬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为“中共中央北方局”。这时，陈昌

浩认同了张另立“中央”的反党行为，率右路军南下并接受了张的任职。由于路线、方针的根本性错误，红四方面军的“大举南进”很快失败，总兵力由8万锐减到4万。

1936年初，红四方面军被迫撤至四川甘孜地区，在这里陈昌浩和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琴秋结为伉俪。不久，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共组中共中央西北局，陈昌浩当选为委员。在贺龙、任弼时、朱德、刘伯承深入细致的工作下，经历南下失败沉痛教训的陈昌浩改变了对张国焘的态度，决心压张国焘再次北上。6月6日，在共产国际代表张浩的努力下，加上陈昌浩等老部下的“倒戈”、“哗变”（张国焘语），张国焘不得不取消伪“中央”。7月初，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8月到达甘肃南部。

8月12日，为实现西北大联合，打通与苏联交通后出兵绥远抗日，中央制定了宁夏战役计划。其要点是：一、当年10月或11月，3个方面军在甘肃北部会师，完成进攻宁夏准备；二、12月，以一个方面军拱卫陕甘宁根据地，另两个方面军和东北军合作，乘冰期西渡黄河，占领宁夏以打通与苏联的陆上交通；三、占领宁夏后，红军与东北军合组抗日联军，出兵绥远抗日。在这个宁夏战役计划中，红四方面军的任务是夺取岷县，进攻陇西等地，支援东北军占据兰州，控制河西走廊。随后，中央致电王明，将上述方案报请共产国际批准。9月，共产国际复电同意。

但是，已经北上的张国焘仍然心绪不宁，“南进”不成又重提“集中兵力西进”，建议占领青海、新疆。于是，9月16至1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岷县召开会议，陈昌浩和朱德坚决反对张国焘不利于三军会师的“西进”意见，主张立即北上甘肃静宁、会宁地区，会合红一方面军联合作战，并制定了《静会战役纲领》。最后，张的意见被否决。会后他对徐向前等人大发牢骚：“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19日，针对张

国焘的“西进”苗头，中央又致电强调：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上，在西北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

9月27日，经多方面争取，张国焘不得不和陈昌浩、朱德、徐向前等联名致电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及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表示尊重共产国际和中央指示，决不再改变。

兵困马乏的西路孤军

1936年10月22日，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西北，造成西北抗日大好局面，这使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如芒刺在背，于是调兵遣将急上西北，其战略意图是：一方面，调集30万大军和100架战机，对立足未稳的红军实施最后的“围剿”，将红军主力歼灭于黄河以东的陕甘地区；另一方面，强令张学良、杨虎城执行其“灭共”计划，并在与红军作战中削弱他们的力量，实现其一箭双雕的险恶用心。

深知蒋介石险恶用心的中共无时不在防备，事事处处施以对策。这时，张学良将军又把蒋介石的有关作战部署通报给中共中央，建议红军尽快实施宁夏战役，控制黄河以西地域，接通与苏联的通道。

尚在10月11日，中共纵观敌我友三方形势，果断作出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其中，红四方面军的作战任务是：一、为阻击南敌进攻，在西（宁）兰（州）通道地区形成扇形运动防御，确保红军主力在预定地区展开；其二，迅速完成造船任务，以3个军西渡黄河攻宁夏。10月24日起，在陈昌浩、徐向前指挥下，红四方面军第30军、9军、5军共约2.2万名指战员奉中央军委命令，相继在甘肃省靖远县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执行打通国际路线的宁夏战役计划。

陈、徐所部强渡黄河后，在“打通国际路线”、“配合一方面军

夺取宁夏”的口号鼓舞下，向盘踞甘肃中西部的马步青部、盘踞青海的马步芳部、盘踞宁夏的马鸿逵部（三部统称“马家军”）展开了进攻。不久，由于国民党重兵隔断了河东红军主力与河西红军的联系，宁夏战役被迫取消。之后，河西红军进入孤军奋战时期。

11月5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你们之河西纵队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乘敌人尚不十分注意你们的时候站稳脚跟，……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8日，中央及军委又提出了《作战新计划》，其决心是：放弃夺取宁夏的原计划，将河东3个方面军的主力组成南路军和北路军，南防北攻，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争取与阎锡山、蒋介石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定；河西部队为西路军，其任务是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苏联），时限为一年。11日，中央正式命令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由陈昌浩任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

对如此重大的变动，陈昌浩、徐向前当时是一无所知，特别是组成南路军和北路军的战略变动，事后也没有得到通报。11月13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蒋介石部队已将红军主力与红军渡河者从中隔断，渡河者现组织西路军，受徐向前、陈昌浩指挥，人数二万二千，今其已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首先占领凉州地区，然后向肃州前进。请你们确实无误的准备从新疆接济物品，并以准备情形迅即电告我们。”15日，毛泽东、周恩来电示徐向前、陈昌浩：“（一）同意你们向凉州进。（二）新疆接济正准备中。”对于中央这一重大而突然的战略转变，陈、徐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在西进的大方向上，3个军交替挺进，迅速西插，打了一系列漂亮仗，沉重打击了马家军。

但是，4天后的11月19日，由于河东形势的需要，周恩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又电示陈、徐，要求西路军停止西进：“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并可以一

部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使敌疑我西路军有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主力企图。”

对于中央的新指示,陈昌浩坚决服从:“马家军基本上已被我击溃,西路军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不成问题,能够完成任务!”而徐向前则认为:“敌人有根据地,有补充、有兵员,能支持长期作战,而我们则相反。你这个结论根本站不住脚!”陈昌浩说徐向前是“右倾机会主义”,徐向前说陈昌浩头脑发热。陈昌浩找军政委员会其他成员谈话,试图对徐向前的“右倾”开展斗争,因多数人不同意才作罢。

11月21日20时、23日20时和24时,面对西路军日益兵困马乏的窘境,徐向前亲自起草电文,连续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请求重新考虑西路军的行动方针。23日至28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战略全局出发,数次致电西路军领导人:“远方接济,三个月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12月6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又致电陈、徐,予以宽慰:“远方可于二个半月后将货物送达安西(注:位于甘肃西部,靠近新疆)。”

西路军兵败祁连山

12月,陈昌浩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张国焘一起,成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其在党内、军内的地位与影响更加突出。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军委主席团随即电示陈、徐: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加紧休整,一面争取马家军抗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占领安西。于是,陈、徐率部进行休整,并对马家军开展统战工作。四五天后——12月18日,军委主席团又电示陈、徐:“你们的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份夺取甘、肃二州。”接电后,刚刚解甲的陈、徐立即动员部队准备西进,准备打击马家军。

不久,张学良又向我党、我军提出要求:为巩固西安侧后方的

安全，希望西路军派出一部分兵力东返，配合河东红军迎击胡宗南部。为此，中共中央征求西路军意见，能否以一部东进抵兰州附近，在东北军于学忠处补给弹药被服，然后东渡黄河作战。这时，西路军刚动员部队准备西进，现在又要东进，陈、徐为此又发生了争论。陈昌浩主张东进，徐向前从军事角度认为西进最为有利，会议将不同意见上报军委主席团，并暂停西进的动员准备工作。12月25日，在陈昌浩的坚持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经过一番争论后给军委复电：“目前时局的开展，西路军利于东进，我们当坚决执行此任务。”

就在西路军尚未东进之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军委主席团又急电陈、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于是，西路军又由准备东进改为筹划西进。

上述可以看出，“三大主力会师后，陈昌浩是坚决跟党走的，他对中央不但是坚决服从而且是近乎盲从了”。今天看来，当时陈昌浩的错误主要是政治上原则性太强而军事上灵活性不够。

12月31日，部队在西进路上举行了辞旧迎新的篝火晚会，广大指战员引吭高歌：“我们是铁的红军，钢的力量，工农的儿女，民族的希望。不打通国际路线，不是红四方面军！”但是，陈昌浩没有想到，这竟成了西路军的最后一次集会，最后一次欢乐。

1937年1月初，陈、徐指挥西路军连克高台、临泽。这里人口较多，粮草丰裕，部队准备稍作休整后继续西进，速夺肃州和安西，力争在短期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武器装备后再向东打个“回马枪”。

就在这时，回到南京的蒋介石翻脸不认人，在扣押和审判张学良之余，又调集40个师的兵力向河东红军及东北军逼近，使军委又一次决定变动西路军的作战方向。1937年1月5日，军委主席团电令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缓西进。”1月7、8